

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 接受唯物史观的期待视野

——基于接受史的考察

王 宁^{1,2}

(1.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2. 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 观澜校区,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接受史注重对接受者“主体性”的研究。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唯物史观满足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这一接受主体所面对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法论期待,契合了当时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认知基础的社会心理,具有在近代中国得以被选择优先接受的历史必然性。此外,进化论思想也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与接受唯物史观搭建了桥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优先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与接受的期待视野。

关键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期待视野;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2-0050-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2.007

On the Expectant Perspective of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iority Accept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Acceptance History"

WANG Ni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Guanlan Campus of Shenzhen Longhua High School Education Group,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Acceptance histor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ccep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eptance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ets the method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erms of "where China is heading", aligning with the social psychology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t that time. It possesses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being chosen for priority acceptance in modern China. In additi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lso serves as a bridge for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ccep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formed the expected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prioritized and accepted by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expectant perspe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2AZD003);2022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 X22_1421)

作者简介:王宁(1996—),男,回族,河北平泉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应该说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前提。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以传播史为研究视角是不够的^①,还要从接受史的视角突出“主体性”研究,即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这一主体的认知基础与心理结构来考察唯物史观得以被选择优先接受的历史必然性。简言之,唯物史观满足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法论期待,契合了他们所固有的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认知基础的心理结构。此外,进化论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接受史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指信息接受者在其固有的认知基础和心理结构的影响下,对所接受的信息带有一种

定向性的期待,也正是这种定向性期待促成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了对唯物史观的优先接受。

一、唯物史观满足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法论期待

近代以降,中国人民在炮火中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此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与沉重的根本问题。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着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抑或是辛亥革命都没能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而此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传入给处于迷茫困顿之中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之光,唯物史观所散发的能够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论魅力深深吸引了他们并被他们所选择优先接受。

(一)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为解答现实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将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旨归。唯物史观指出,人的自由的实现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演

① 目前学界对接受史的研究多见于文学艺术领域,如张毅之的《唐诗接受史》等。但是,这并不代表学界不存在对唯物史观的“接受问题”视角的研究,目前学界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研究已然显露出从“传播”到“接受”的范式转型的基本路径与趋向。其中,对唯物史观的接受问题研究已有部分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传播学范式下更加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选择与接受。例如,梁枫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论纲》探讨了唯物史观为何会被广大的中国人所接受的社会历史必然性;蔺淑英的《“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唯物史观探源》考察了五四前后中国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选择唯物史观进行传播;王刚的《积极与消极: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和论述了进化论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二是从哲学解释学的维度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理解和阐释,这实质上也是对唯物史观接受问题的研究。如王玉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嬗变》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对中国人为何接受唯物史观、唯物史观首先被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三是对唯物史观接受史的零星研究。如刘招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接受史研究》、李勇的《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以上学者是从经典文本以及人物作为接受主体本身出发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史展开研究的。可以看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史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尚未形成体系,因此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究与挖掘。

变。因此,想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有赖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2]15}。正如施存统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以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非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注意唯物史观,就是别的社会主义者,也非注意唯物史观不可……我们如果真要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遵守唯物史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3]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在实践维度验证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理性,使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能够帮助内忧外患的中国找到前途和方向。

(二)唯物史观提出了科学的认识方法,为解答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这一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变,甚至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社会革命,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恩格斯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实践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760}阶级斗争的方法让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前一亮,他们认为从中找到了可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并“将其学说实际其行动,

干社会的革命”,简言之,他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社会革命的原动力”^[5],“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科学方法”^[6];并且,他们还尝试将这种独特的社会分析方法运用到对近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之中。必须承认,唯物史观的确使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认识近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极富学理性与革命性的认识方法,正是彼时不知中国向何处去的早期知识分子所亟需的理论武器。

(三)唯物史观指明了人民创造历史,为解答现实问题找到了主体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来把握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才是全部历史活动的承担者,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加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特别是中共早期知识分子通过研究唯物史观已经认识到,劳动阶级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他们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8],“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礎”^{[2]262},是革命的主体力量^[9]。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在众多“主义”中脱颖而出并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规律的学说,其对象是人们熟知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并且可以从中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因而它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10]。简言之,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特质满足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期待。

二、唯物史观契合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认知心理结构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基因‘契合性’和价值‘一致性’，因而能在中国落地、扎根。”^[11]从接受史的研究视角来看，当从小受东方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时，必然会将其带入自身固有的认知心理结构中去解读，这种“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亦即没有在情感、观念上强烈的排拒感、难以接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12]。因此，这种认知心理层面的熟悉和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接受。而唯物史观恰恰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某种学理上的“亲和性”，契合了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积淀和认知心理结构，因而更易于得到他们的认同与接受。

（一）“庶之、富之、教之”的民生思想与重视物质生产实践的唯物史观相契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生与政治紧密相连。《管子》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论语》简言之：“庶之、富之、教之。”这是一种朴素的民生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价值追求。显然，重视物质生产实践的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其以此为基础的认知心理结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222}从社会生产层面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这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固有的民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耦合性。

（二）“躬行践履”的实践思维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史观相契合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素来把实现理想人格作为其根本目的，把“躬行践履”作为其根本学问，强调在“躬行践履”中实现从君子到圣人的飞跃，这是一种“内证圣智”式的实践思维。孔子十分重视个人的笃行，教导人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陆游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躬行践履”的哲学追求。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明确将实践提到了首位。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注重实践效用的实用理性思维。

而实践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刻地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139-140}这是马克思将唯物史观用于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所得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在该文文末更是以结论性的语气直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136}马克思对实践的重视可谓旗帜鲜明，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4]103}。可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品格。这种重现实、重实践的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践履躬行”的实践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具备了在学理上契合的可能性，也更容易获得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

（三）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民本思想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唯物史观相契合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核心，而这种民本思想也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礼记·礼运》强调：“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到了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就从爱亲人推及爱众人、爱万物。在孟子之后，宋代的理学家张载又进一步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观点，强调要“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的民本思想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认知心理结构中,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唯物史观也十分强调人的“社会特质”,批判离开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¹³⁹这一论断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理解人的本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看重。唯物史观使哲学真正回归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最终指向的也是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哲学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同样也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关系为重点,寻求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维护封建帝王“家天下”的秩序框架之内的,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人民立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重视其历史地位与强调人的价值主体性上,二者在哲学观上有着天然的亲和性,这也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除此之外,传统中国“人道有为”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认同及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追求等,也都展现了二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相通性与相融性,这种相通性与相融性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的实质性因素。

三、进化论思想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搭建了桥梁

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一部文本之前,脑中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带着其原有的认知与生活经验来加以接受,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定向性的心理结构图式。因此,读者之前所积累的认知经验会对其阅读、接受新的文本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期待视野也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接受主体的实践发展而不断修正和拓宽。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和认知心理结构影响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自小形成的期待视野的话,那么进化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则为其拓宽了期待视域。19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促使他们解放思想与推动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朱执信等人也都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成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的文化心理基础,由进化论思想带来的这种“熟悉感”帮助他们很快理解和接受了唯物史观。虽然通过进化论来理解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进化论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桥梁作用,构成了他们对唯物史观期待视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921年,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曾这样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15]从中可见,进化论思想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认同与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中介或“前理解”。

(一)中国古代朴素进化观与进化论思想相契合

《周易·系辞下》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变”是实现“通”和“久”的重要途径与方法,这种朴素的进化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呼吁社会变革、尝试政治改革的重要思想支撑。无疑,朴素进化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康有为又将这种朴素的进化观与西方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相糅合,创立了一套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中国传统进化观与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相结合的“公羊三世说”,认为孔子当初“作六经”也是以

《易》《春秋》“发明改制”的,“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16]。中国古代这种朴素的进化观为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基础,坚信“新的一定战胜旧的”逐渐成为众多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认知共识,拓宽了他们的期待视野,也为他们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搭建了思想桥梁。

(二)进化论思想与唯物史观在内容上的耦合性

“十九世纪而后,学问路上有两大指南针:一为达尔文进化论,一为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与进化论有相同之处,亦多相成之处。”^[17]此处的“相同之处”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容上的耦合性,可以从“物竞天择”与“阶级竞争”、“利益优先”与“经济基础”以及“世道必进”与“螺旋上升”这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其一是从“物竞天择”到“阶级竞争”。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观点便是“物竞天择”,即强调生存斗争是推动物种进化的重要动力,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其二是从“利益优先”到“经济基础”。《天演论》强调了“天择”在国家间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强弱差异,这体现为一种“利益优先”的原则;而唯物史观也同样十分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其三是从“世道必进”到“螺旋上升”。“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是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与趋势;而唯物史观则不仅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和上升的,而且认为存在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进化论思想与唯物史观在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耦合性,这种耦合性正是“多相成之处”的前提和条件,这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奠定了认知与解读基础。

(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演变

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数进化论,众多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都是从接受进化论思想走向接受唯物史观的,其中最

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朱执信等人。以李大钊为例,他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便是一位进化论思想的信奉者,他在《青春》一文中以进化论思想为理论依据,指出:“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沈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沈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19]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对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桥梁作用。仅以此为例说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选择优先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虽然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有着本质区别,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理解唯物史观也“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误读’”^[20],但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进化论为思想桥梁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观念,即试图结合进化论的原理来说明和接受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6.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3] 施存统.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J]. 新青年, 1921, 9(4).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5]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50.
- [6]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841.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96.
- [8]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69.
- [9] 朱执信. 朱执信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51.

- [10]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方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57.
- [11] 韩庆祥. 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95-105.
- [12]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57.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3:78.

- [16] 康有为. 中庸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222.
- [17] 李维汉. 李维汉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
- [19]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2.
- [20] 王刚,顾清. 积极与消极: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4):137-144.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49页)人民为共同富裕福祉的享有主体,立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需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也需要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要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推动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再次,要坚持以人民为共同富裕阶段性成果的评价主体,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增强民生福祉中推动共同富裕。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共同富裕实现成效的最佳尺度,要及时洞察和深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意愿和诉求,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民生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21-12-11(1).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4.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
- [7] 张占斌.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理论视野,2022(11):50-57.
- [8] 黄建军.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逻辑及实践层级[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3):100-111.
- [9] 杨文圣,张玥.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9.

(责任编辑:白丽娟)